



不是题材决定了作品的成败，而是叙述方式决定了作品的存在

——叙事文学的内容与形式

□张志强

作家必须有自己独立的思考、独特的发现，独具话语权的书写。今天的读者视野开阔、思维活跃，看得多、见识多，想满足这个时代的读者必须有点“绝活儿”

美国作家马克·肖勒说：“现代批评向我们表明，只谈论内容本身绝不是谈论艺术，而是在谈论经验，只有当我们论及完成的内容，也就是形式，也就是艺术品的本身时，我们才是批评家。内容（或经验）与完成的内容（或艺术）之间的差距便是技巧。”（《技巧的探讨》）当作家只关注故事，其实仅仅是在关注现象，也就是经验。然而当叙述经验的时候，作家永远赶不上当事人，作家只是一个倾听与转述者。作家所了解的“真实”和“事实”是通过采访、阅读获得的。也就是，作家的写作，特别是散文、传记、报告文学等非虚构的写作，表面上看，似乎都是从实地采访获得的“现场”事实，但实际上很少有直接经验的参与，依赖的是间接经验与知识获得的。换句话说，文学作品所展现的现实并非经验，而是作家以旁观者的角度记录、推理、描述与判断。从经验到艺术，作品所展现的事实是被作家所描述的真实与真相。

或者说，作家在作品中所描写的“经验”即内容，其实是他的经验，并非是自己的。即使我们到了现场、事发地，我们也仅仅是听当事人讲述。那么，我们怎么知道被采访者说的就是事实呢？当事人所讲述的事实，其实是经过了自我过滤的事后回忆，而作家把他自己过再次加工的事实写到作品里，就是真相了吗？显然，这是令人怀疑的。《切尔诺贝利的悲鸣》这样的作品，尽管是以“口述实录”的方式，由当事人讲述事件的过程，但是，却也是由作家选择性地请当事人在讲述。也就是说，作家是根据需要进行倾听，而不可能是个完全开放的自然的事件的呈现。

因此，报告文学追求的真实、真相、真理都是相对的，没有绝对。马克思也讲

真理的相对性，世上没有绝对的真理，真理都是相对的。

既然没有绝对的真理，那么，看待真相的角度，探求真理的立场便尤为重要。一切都是相对的，我们所表达的仅仅是我们听到的、看到的、经过选择的内容。所谓真实、真相和真理是作家站在一定的时间视角、空间位置和一定立场所阐述的，是被筛选的“真实”。即所有的真实、真相都是相对的。

有些事情，即使是作家本人经历过的，如李兰妮的《野地灵光》描写的是自己的精神病史，是作家自己的“亲身”经验，但当她作为作家坐在书桌前来写这部作品的时候，她是清醒的、理性的，否则她无法去表达自己的经历。那么，《野地灵光》是绝对的“真实”吗？这与“口述实录”的作品有什么区别吗？事实上，当作家写作的时候，她已经是一个“旁观者”了，她其实是在叙述另一个他者，而不是自己——也就是作为旁观者在讲述一个精神病患者的住院经历。

一个事件有多种侧面，我们为什么偏偏要写这些，不写那些，因为作家是有选择的。选择的结果是与需求或者是与作家想表达的目标相关联的，是带有作家片面认知和主观诉求的客观。一个“正面事件”，从相反的角度看，可能就是反面教材。一个事件有可能有更多的叙述空间，为什么我们偏偏就看到了光明和幸福？为什么有的人在灾难面前只看到了那些活着的人的苦难与挣扎，而忽略了那些死者和死者家人的感受？

作家立场决定了作家看到的所谓真相。毛泽东的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说得很好，我们首先要搞清楚“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”的问题，给谁写，就站在谁的立场上，为谁服务。接下来的问

题是，作家所写的“真实”是什么？我以为，作家表现的“真实”是作家内心的真实，是由作家的身份和立场决定的。作家的背景、认知和作家本身的出发点，决定了作家所了解到的“真实”。

作家所叙述的世界多少都是对现场、现实和现象的有需要的剪切与组合。这就涉及到了文学的故事和话语的关系问题。大多数作家对于故事的热情远大于对话语（形式）的追求。多数情况下，我们会选择那些能够引起重大反应，会带来根本利益的题材。故事是作家所表现的内容，或者称为经验的东西，而话语就是形式，也就是如何说出来的，由谁说的？查特曼用一句话简单地区分了故事与话语：“故事是叙事表达之内容，而话语是该表达之形式。”（《故事与话语》）事实上，一篇作品的好坏，最重要的是话语，也就是如何说。一个平常的题材，在注重技巧形式的作家手里可以写出美文，而一个平庸的作者会将一个好题材写得索然无味。同样的题材、同样的故事，在不同人的手里会写出不同的效果。这就是因为技巧与方法，也就是形式的支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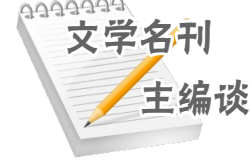
以报告文学为例，有人质疑其“颂歌体”的问题，事实上，是歌颂还是揭露，是写光明还是写黑暗，这并不是本质的问题。问题出在叙事的话语形式上。对于有些作家来说，即使歌颂也会写得非常艺术化、个性化。而有些作家，即使让他去揭露也未必能写出好作品来。“好作品”指的是文学化、艺术化的作品，而不是那些表扬稿之类的非文学作品。虽然许多作家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作品是表扬稿，但事实上，这个帽子在某些人开始写作的时候已经悄然准备好了，从作为定位的文艺是为什么人”的问题，给谁写，就是个写作能力问题，而不是写什么的

问题。

作家是孤独的个体，但并不是完全听命的士兵。他必须有自己独立的思考、独特的发现，独具话语权的书写。笔在你的手上，大脑也长在你的肩上，写作时一切命令却都得听从作家自己的内心与良知。飞速发展、日新月异的时代对于写作者而言是个巨大的挑战，今天的读者视野开阔、思维活跃，看得多、见识多，想满足这个时代的读者必须有点“绝活儿”，一般的吹捧和抬轿是无法让他们信服的。把颂歌写出特色来，把歌唱写得文学化、艺术化，就需要恰当的形式。以什么样的语言方式，什么样的结构方式，什么样的叙事角度，选取什么样的事件写进自己的作品，都是考验作家能力的重要方面。特别是大多数作家所面临的不只是写一位英雄和“先进”人物，而是写群体，要表现我们这个时代的集体先进的时候，难度就更大。集体如何写，群像如何描绘，这需要找到独特而有说服力的方式，也就是找到合适、恰当又有新意的形式，这决定了作品的高低。

优秀的作家在创作之初，就要考虑到作品叙事中的叙事者、叙事视角、叙事声音、叙事时间、叙事空间、叙事结构、叙事语言等话语形式。在我们设想的作品中，由谁来讲述，从什么角度来讲述，用什么样的叙事声音，以什么样的叙事时间和叙事空间位置，用什么样的结构来讲，使用什么样的语言方式来讲，都是需要首先思索的。当我们意识到，作家所描写的世界是由间接经验开始的话语形式时，我们就会意识到对于作品起决定作用的不是“写什么？”更是“如何写？”不是题材决定了作品的成败，而是故事的叙述方式决定了作品的存在。

（作者系国防大学教授）



“办刊物，内在质量还是第一位的。刊物就像一座建筑，需要结构，需要顶梁柱，高质量的栏目设置就是结构”



2017年春节后，时任江苏作协党组书记的韩松林找我谈话，有意让我出任《雨花》主编。当时我是犹豫的。我2013年才从河海大学调入省作协，专业创作，其初衷就是希望一心一意地写作，如果编刊物，无疑要分心。但从四月开始，我还是到《雨花》上班了。

《雨花》是老牌刊物，1957年创刊，我上班后参加的第一个重大活动，就是“《雨花》创刊60周年纪念座谈会”，筹备这个活动时，我借此梳理了《雨花》的历程，老实说，心里有点沉甸甸的。60年一路走来，风风雨雨，接力棒交到我手上，我有压力。与会大约两百人，许多《雨花》的老人也来了，老编辑、老读者、老作者，他们白发苍苍，说起往事时十分动容，我被触动了。我应该为《雨花》增添光彩，至少不能在我手上衰落下去。

我也曾是《雨花》的作者。上世纪80年代，我就在《雨花》发表过短篇小说，我第一个被《小说选刊》转载的中篇小说《游刃》，就是《雨花》首发的。这是一种缘分。我很希望能有个“开门红”。我精心组织了一篇稿件，写的是一个华裔教授，她给一个因为抄袭被退学的留学生写了一封信，有批评、有劝导。作者本人是一个资深哲学教授，为人端严、诚挚，这个学生还是她亲手录取的。我选择在第七期发表，这是因为七月正是留学期，许多家庭正送孩子负笈远行；考虑到文章可能的影响，我与作者商议，这封信作为小说发表，作者也署名，文中的学校、人物均用化名。我似乎考虑得很全面，预料到文章会有影响，但没有想到，影响力居然那么大。文章刊出后，许多网站立即转载，有的还抬头去尾，换了笔名听闻的题目。《雨花》公号点击率节节攀升，即便我立即要求撤下了文章，显然还是创造了雨花公号的一个空前也可能绝后的纪录。许多大学教授告诉我，他们都在弟子群里转发了，他们希望学生们扎实学习，引以为戒。这出乎我的预料。与此同时，指责和批评也出现了，认为这篇文章放大了留学生的某些负面行为。我在心里说，抄袭难道是对的吗？我们每个学校的学籍管理制度，不都写着禁止抄袭和作弊吗？钱学森先生留学海外，他学到真本领，能报效祖国吗？那段时间，很多电话打到了编辑部，国内的、海外的，我一概不接，“人不在”。我不便说话，心理压力巨大。我似乎是犯错了，闯祸了。这个时候，韩松林书记对我说：“我不觉得这篇文章有问题。”我放了一点心。直到《人民日报》的网站也转载了这篇文章，这才算一锤定音，尘埃落定，我心里的石头落了地。

60周年纪念座谈会和这篇文章的风波，对我是一种“入职教育”。定下心来，我知道我的责任，还是把刊物办好。

调入作协前，我在大学出版社工作多年，有出版经验。我首先着手搜集过刊，梳理历史脉络，在办公室显著位置陈列；建立稿件档案管理制度；明确了交叉审稿和校对制度；为了切实提高出版质量，我又增加了“发行前审稿”程序，由副主编和我再审一遍。出版行业有句老话“书卖一张皮”，这当然不全面，但明确指出了装帧和印制的重要性。我们从刊名书法、封面、用纸、内文版式和颜色搭配等方面，对刊物进行了总体设计，《雨花》的装帧有了变化。编校质量也有了提升，此后，抽查结果都在“良好”以上，获得了上级管理部门的充分肯定。

“内容为王”。办刊物，内在质量还是第一位的。刊物就像一座建筑，需要结构，需要顶梁柱，高质量的栏目设置就是结构，其中，“名家专栏”可算是顶梁柱。丁帆、于坚、南帆、王尧、刘琼、阎晶明、李修文、邱华栋、潘向黎、郜元宝诸位的专栏文章，次第登场，他们娓娓而叙，翰墨飘香，这个专栏很快便赢得了好评，成为各大出版社竞相邀约的书稿。“2022花地文学榜年度散文类”的十部散文中，就有王尧《时代与肖像》、刘琼《花间词外》、南帆《村庄笔记》入列。“名家专栏”为《雨花》赢得了口碑。

江苏作协对《雨花》有一个特别的要求：培养青年作家，为打造“文学苏军新力量”出力。我深知，刊物与作家、读者，是一种共生关系，有时候，作家与刊物可以互相辅成。青年作者正在起步阶段，特别需要扶助。《雨花》可以是对他们奔向更大舞台的起跑器。我们设置了两个栏目：“雨催花发”和“绽放”，前者针对文学新人，在他们启动时，《雨花》修改、发表作品，并配评论，助力一把；后者主要面向已有相当创作实绩、有待扩大影响的青年作家，《雨花》除了发表一组作品，配评论，还列出创作年表，以方便研究者检索。这两个栏目推出了许多青年作家，有的已在文坛崭露头角。《雨花》又择其优者，举办了他们各自的首场创作研讨会。

《雨花》是江苏的文学刊物，可决不能办成“省内刊”，不重视在全国文学期刊界的定位，我们就不可能做到第七、第八届鲁迅文学奖。《雨花》都有短篇小说入围前十。但培养新人，确实又是文学永续发展的关键。《雨花》开办了“雨花写作营”。我接任时，已经办了一届，这些年，《雨花》坚持了下来，并力图创新。迄今为止，写作营已经连续举办了七届，组织了17场改稿会，我们邀请各大文学期刊的主编和资深编辑为学员改稿，面对面交流，有182人次参加了改稿和培训。江苏省委宣传部主办的文艺“名师带徒”工作，其中的徒弟，有约一半都是雨花写作营的学员。我们对江苏文学新人的分布格局和发展态势，做到了心中有数。

都知道我也是个作者。有赖于整个团队的努力给力，各司其职，冗杂的编务还不是太大的问题。对我的写作有磨损的，其实是大量的审稿和改稿。改稿有时比写稿还要费脑子，即便来稿闪烁着才华，达到了发表水平，也还是有个水平高低。为了保持自己的水准面貌，不被大量的审稿带偏节奏，我只能通过对名著和古籍的反复阅读来校正航向。这看来还是有效的，否则，我不可能在2022年写出我的第五部长篇《万川归》。

（作者系《雨花》主编）

《雨花》是他们奔向更大舞台的起跑器

□朱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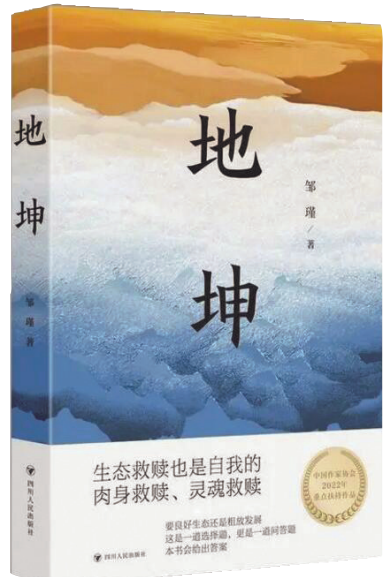


短评

是生态救赎，也是灵魂救赎

——读邹瑾长篇小说《地坤》

□张咏



《地坤》，邹瑾著，四川人民出版社，2023年9月

当今世界，全球性环境危机日趋严重，导致地震、海啸等全球性灾害频仍。私挖滥采、过度开发、破山开矿、毁灭生态、污染环境，长远来看，无异杀鸡取卵、竭泽而渔，乃得不偿失之举。

《管子·立政》有云“草木植成，国之富也”，意谓草木繁荣成长，国家自然富足，充分体现了古人朴素睿智之生态环保意识，盖因良好生态本身即蕴藏着巨大的经济社会价值。当下，以生态文明、环境保护为主题，创作散文随笔等文学题材不乏佳作，衍生发挥为长篇小说则较少见，作家邹瑾先生近著长篇小说《地坤》，应为其中卓荦可观者。

作为中国作家协会2022年重点扶持作品，《地坤》以位于国家生态自然保护区、大熊猫核心栖息地的康乐市凤城县清龟山为背景地，此地山明水秀、物产丰饶，素以“清龟四宝”闻名于世。在资源大开发、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背景下，矿山滥采、农田流失、河道侵占、水土污染等破坏生态环境行为愈演愈烈，清龟山千百年来安宁和谐的自然生态环境，一度蒙上褪色，地方百姓怨声载道。程子寒、韩月川、邱之兰、刘源森、李谷雨、林旭晖、胡常威等人，分别在“生态大保护”和“资源大开发”这两条截然相反的发展道路上，展开博弈斗争，正义与邪恶、磊落与阴谋、君子与宵小，就此一较高下……

该书以自然生态及官场现象为突破口，将生态文明主题、传统文化旨趣和章回体小说形式三者融合锻造、揉为一体，将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统一。作者邹瑾作为学者型官员，究心经史之学，明于时势又长于议论，曾主政地方及省级机关

插渗透、缠绕纠结，共相生长。作者特别拈出“生态位”这一名词概念，指出自然界物种，包括身处大自然中的人类，各有其自身的生态位，应当各居其位、莫侵他位，方能各自相安、天下太平。一旦偏离了正常的生态位而去强行争做强者，无限度地侵占他人之位或掠夺自然资源，追求短期效应及经济效益，都不会长久。正如《资治通鉴》中所谓“地力之生物有大数，人力之成物有大限。取之有度，用之有节，则常足。取之无度，用之无节，则常不足”，取用有节则常足，反之则常匮乏。“生态救赎也是自我的肉身救赎、灵魂救赎”，“要良好生态还是粗放发展，这是一道选择题，更是一道问答题”，对于以上论点，作者于书中三复斯言、剖切陈词，希冀大自然、政治官场、社会环境都要进行严格的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，保持尊重敬畏、守护心性澄明，以积小善而成就厚德载物，维护宇宙内外之平衡和谐。

所谓“生态救赎”，亦体现于所谓“清龟四宝”称谓上。“清龟四宝”，原指大熊猫、猛犸、绿翠玉石及老川茶这四大清龟山地方名产，其后则由物及人，将酒宝孙玉珉、色宝胡常威、吃宝袁九金、赌宝马来福称为“清龟四活宝”，此四人后因事相继天亡或入狱，喻指旧有秩序与乌烟瘴气的生态环境之毁灭消散；另则取代以道姑惠梅、邱之兰、夏贝竹、喻小菊这全新的“清龟四君子”，将低俗浑浊不堪之酒、色、吃、赌四活宝，改为清新典雅、高华素洁之梅、兰、竹、菊女性四君子，由俗趋雅、由邪反正，由乱而治、由废而兴，亦有清龟山焕发盎然生机、天地翻覆巨变之寓意，以及拨乱反正、前后呼应之妙。

书中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因子异常丰富，且表述时切近事理。如写程子寒、文运昌、鲁道长三人龟泉寺中品茶论道，数次援引《周易》《左传》《道德经》《淮南子》《鬼谷子》等中国传统典籍相关论述，揭橥出“自强不息”“道法自然”“九尺垒土”“人奔奔则妖兴”等阐释古代哲学理念，兼及茶经、书法等艺术形式，充盈着对于中国传统文学和国学经典的敬畏，与对生态环境资源之敬畏守护，相与表里统一。

小说名《地坤》，出自《周易》八卦中之“坤卦”，“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”，借由鲁道长之口而出道，看似充满玄妙灵机，实则大有朴素真理存焉。盖因人类脚下赖以立足生存之大地，宽广博大能容纳自然万物，其德温厚柔和而不欺，人类切不可因其温良之性而恣意妄为，摧残毁灭大地母亲，而当竭心尽力守护之、善待之。唯此，方能臻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大美境界，否则，必将堕入万劫不复之魔障深渊。

正气存内，上善若水；厚德载物，天乾地坤。中国式现代化，是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，更应是不带灰尘、不染血腥、不含浪费、不急功近利的科学发展方式。走一条生态环保、资源节约、绿色低碳的可持续发展之路，是执政者的不二之选，亦是文化自信、文运昌明之一端，将充分彰显建设文化强国之自信与担当。邹瑾先生所著《地坤》一书，完美深切地揭示出习近平总书记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这一重要思想理念，大有警世、醒世、喻世之功用，深愿读者细心体味。

（作者系南通大学生态文学所特聘研究员）